CHINESE STUDIES MONTHLY 中華研究月刊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awcsrw72

Semiotic Enco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义勇军进行曲》的符号编码与国族认同建构

Ni Yang [1], Yuhong Li [2,*]

Received 8 September 2026

Revised 13 October 2026

Accepted 27 October 2026

Published 31 October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how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came to function as a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multiple images such as the "Great Wall of flesh and blood," the lyrics naturaliz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to an enduring national spirit, while musical signs—including the bugle-like introduction and ascending scalar patterns—evoke embodied resonance. Through collective singing, media circul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 song continuously generates and accumulates new meanings. Following its adoption as the national anthem, state ritual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flag-raising ceremonies and school education, transforme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the song into collective and structural memory, ultimately consolidating it as an enduring symbol that transcends its original historical context.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rough semiotic encod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has become internalized as part of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Semiotics; Mythological rhetoric; National identity; Collective memory; Meaning production

ISSN 2759-8394 (Online)
ISSN 2760-3296 (Print)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Jandoo Press Co., Lt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摘要： 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去分析《义勇军进行曲》如何成为国族认同符号。歌词通过"血肉长城"等多重意象将历史自然化为永恒的民族精神，旋律中以号角前奏、上行音阶等音乐符号激发身体共鸣。歌曲通过集体歌咏、媒介传播等途径在互动中不断增殖意义。成为国歌后，它经由升旗仪式、学校教育等国家仪式，从个人体验转化为集体记忆和结构性记忆，最终固化为超越历史的永恒象征。研究表明，歌曲通过符号编码与意义生产，内化为民族的文化底色，持续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关键词： 《义勇军进行曲》；符号学；神话修辞术；国族认同；集体记忆；意义生产

作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号声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延续到新时代，始终嘹亮不息，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如孟凡东、周星江从"'何以形塑'视角切入，阐释该曲在内容与形式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性建构"[1]；刘丽英、郭鲁川认为，"诞生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并一直传唱至今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样应当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象征之一。"[2] 或集中于音乐结构与曲式分析，如童忠良指出"其曲式段落严格遵循黄金分割律"[3]。姜涛分析"该曲音乐结构的独特性 、歌词运用自由体新诗歌的呐喊性以及军号独奏的引子与纯四度向上跳进 的'核心音调'的手法"[4]或是将《义勇军进行曲》放在历史语境下，同同类型抗战歌曲一同进行分析；曹铃玉认为"用抗战音乐在危难时刻来承载民族大爱 最有效可行"[5]然而，鲜有研究从符号学视角系统考察该曲如何通过多模态符号编码实现国族认同的生成与传播。本文将以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与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为主要理论框架，重点分析歌词中"长城""奴隶""吼声"等象征符号的神话化操作，旋律中号角前奏、上行音阶等音乐符号的指示性与像似性功能，并进一步考察传播场域中符号意义的互动增殖、仪式化场域中个体情感到集体记忆的转化，以及国歌法定身份如何将歌曲固化为超越历史时空的结构性记忆符号。通过这一分析，本文旨在发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战歌到

[1]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2]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xr60514@163.com

国家象征的符号转化路径，以及其持续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生产的内在机制。

符号编码与意义生产：抗战动员的符号学机制

歌词符号的“神话”建构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之所以能超越一般战歌的时效性，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根本原因在于田汉在歌词中进行了一次罗兰·巴特意义上的“符号神话化”操作。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神话负有的责任就是把历史的意图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偶然性以永恒性为依据。”[6]田汉在歌词中对“长城”“奴隶”与“血肉”等一些符号的征用与重释，正是这一理论在抗战文艺中的典范性实践。

在歌曲中作者让长城这一物质防御工事，向民族精神聚合体的形式进行了象征蜕变。在常规语言系统中，“长城”的能指指向一座具体的、位于北方的砖石建筑。然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历史语境下，田汉通过“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具有张力的修辞，暂时切断了长城与其作为物理实体的固定联结。在这里，“砖石”被置换为“血肉”，“被动防御”被改写为“主动献祭”。巴特认为，“神话的功能是扭曲，而不是使之消失。”[6]“血肉长城”这一复合意象，将个体生命的牺牲符号化为集体存续的屏障，使每一位演唱者在发声的同时，都完成了从“被保护者”向“保护者本体”的身份转变。它不再是客观事物的简单陈述，转而成为关于“全民皆兵、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歌词中的“奴隶”与“吼声”构成了一组关于民众主体性觉醒的神话对位。在歌词的起始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奴隶”这一能指被注入了超越其政治内涵的历史所指。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亡国奴”是弥漫于社会底层的集体恐惧。田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否定词“不愿”作为前置，将消极的“奴隶处境”翻转为积极的“抗争合法性”。而“最后的吼声”，则被强化为民族内在压抑力的“神圣宣泄”。巴特在分析现代神话时强调，神话要将历史“自然化”，即让受众觉得这一切本该如此。同时“声音作为一种与权力网络紧密交织的关系性现象，它塑造着一个地方、一片地域乃至整个空间中的身份认同与集体生活感知。”[7]当万千民众在广场、工矿、战场齐声吼出共同音节时，零散的个体噪音被统合为宏大的民族原声，这种声音符号的同一性，强有力地掩盖了当时社会阶层、地域、党派所造成的现实裂隙，在符号层面先行构筑了“万民一心”的拟像。

“起来！前进！”作为指令性符号的规约化，完成了神话的仪式闭环。从皮尔斯的符号分类来看，“起来”与“前进”原本是带有强烈指示符色彩的动词，原本指向物理空间的位移。然而，在歌词反复咏唱形成的“符号规约”中，它们脱离了具体的空间指向，升华为关于“历史进步方向”的象征符。演唱“起来”不再仅仅是站立的动作，而是对“投身于民族解放洪流”这一抽象价值观的符码化确认。“如果没有语境条件，语言就难以成为指示符号，更无法彰显其没有歧义的指示作用。”[8]每一次歌咏会与集会上的齐唱，都是对这一神话体系的重现。通过操演，巴特笔下那个“既不言说也不沉默”的神话，成功将残酷的战争现实加以提纯——牺牲不再只是毁灭，而是成为通往“新的长城”这一崇高客体的必经仪式。由此，《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完成了一个自洽的神话叙事闭环：在“最危险的时候”，通过“血肉”祭奠，唤醒“奴隶”的主体意志，最终在“前进”的动态中达到民族的永续。这一符号神话的建构，正是其在传播前便内嵌于文本的、能够撼动灵魂的深层密码，也为后续的社会动员预设了强大的情感势能。

音乐符号的“指示”与“像似”功能

如果说歌词通过“神话化”在理智层面唤醒了民族意识，那么聂耳谱写的旋律则是在感官层面直接指挥了人们的身体。依据皮尔斯的符号分类，音乐中的某些声音并非仅仅是悦耳的装饰，而是精确的“标引符”与“像似符”它们像“警报”一样直接告诉你有情况，另一个像“模仿”一样让你仿佛“看见”了某个动作。正是这两者的结合，让《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具有了超越语言的动员能力。

歌曲开头使用了军号式的前奏，是一个典型的“标引符”。所谓标引符，“人们从与客体有关联的事物中寻找可以代表该事物的符号”[9]——就像听见雷声就知道要下雨，听见警报就知道有危险。聂耳在这里用几个简短有力的高音，模拟了战场上冲锋号的音调。对于任何经历过或对战争有了解的人来说，号声只有一个含义：战斗要开始了，全体准备行动。这个前奏一响，听众不需要任何歌词提示，大脑就会自动进入“临战状态”。这种“指示性”设计极其高效，它让歌曲在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就实现了“危机预警”，把坐在电影院或广播前的普通民众瞬间拉入了弥漫硝烟的精神战场。

其次，主旋律中“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句，则是“像似符”的绝佳体现。所谓像似符，就是声音与它要表达的事物之间存在“模样”上的相似——就像用低沉的鼓声模拟雷声，用轻快的音符模拟鸟鸣。聂耳在这一句中，让旋律的音高像爬坡一样逐次往上走，节奏上则像人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站起来。当受众听到“起来”这两个字时，旋律本身就在表演一个“从下到上”的动作。它不是平铺直叙地告诉你“要站起来”，而是用声音的走向让你在听觉上“看见”了站立的过程。这种像似性让抽象的口号变成了肌肉可以跟随的指令，很多民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不自觉地就会挺直腰板、握紧拳头，这正是因为旋律像足了奋起的瞬间。

歌曲中段的“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旋律上也充满了“像似”的处理。这一句的音调被压低、音符变得短促密集，听起来像极了人们在极度压抑时胸腔里的那

股闷气在翻滚——好像有话说不出来、有劲使不上，憋在嗓子眼里打转。而当旋律走到“吼声”二字时，声音突然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猛地拔高、放开。这种先压后放的旋律走势，像似了一个人从忍气吞声到终于忍无可忍、爆发出呐喊的完整心理过程。听众即使不懂任何乐理，也能在生理上感受到那种“憋屈到爆发”的情绪曲线，从而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压抑感投射进歌曲之中，完成情感的共鸣。

正是因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嵌入了如此鲜明的“指示信号”和“动作像似”（上行→站起来，先压后放→憋屈到爆发），它才具备了穿透阶层、地域甚至政治立场的原始感染力。也正因如此，从国民党军校将它定为军歌，到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将它编入战歌集，再到新加坡电台用它作为开始曲——不同立场的人们虽然在政治上意见相左，却在解码聂耳埋藏在旋律中的这些“行动指令”时出奇地一致。他们都听懂了那段号声在说有危险，快行动，也都在“起来”的上行旋律中感受到了“必须站起来”的身体冲动。这首歌不是因为它被广泛传播才变得有效，而是因为它用最朴素的声音符号把战斗和站立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所以它才必然被广泛传播。

传播场域中的符号互动与“解释项”循环

歌曲的意义，从来不封存在创作者的笔下。皮尔斯指出，“符号的完整意义取决于它在接收者心中激起的‘解释项’”[10]——即受众对符号的理解、感受和后续行动，而这个解释项本身又会变成新的符号传递给下一个人，引发下一个解释项，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义勇军进行曲》正是通过这一“解释项循环”机制，在抗战时期的传播场域中完成了从电影主题歌到全民族精神图腾的意义飞跃。当一个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歌词中“起来”的号召和旋律中“像站起来一样”的上行音调，在他心中激发的解释项可能是“这歌在催我行动”，这个朴素的理解直接转化为身体反应——他跟着哼唱、挺直腰板，而他发出的歌声又成为新的符号传递给身边的人，如此“一人传一人、一耳传一耳”，意义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当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人齐唱时，这一循环机制呈现出爆发式的集中效应，数千人同时发出同一套声音符号，每个人听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声音，更多的是周围人发出的相同音符，这种听觉上的同频在每个人心中催生了一个关键的解释项——“原来这么多人和我一样”，这个解释项又迅速反馈给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我唱出的“前进”被你听到，你唱出的“前进”同时被我听到，解释项在空气中交汇互证，最终凝结为共同的体验：“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们是一个整体”，此刻歌曲的意义已不再是田汉和聂耳最初赋予的那个版本，而是在合唱场域中被集体再创造出来的新意义；而报刊、唱片和广播电台的介入，则让解释项循环突破了面对面的时空限制，1935年《申报》刊出简谱，使得视觉符号取代现场歌声成为新的传播起点，不识谱的读者单看歌词也能在心中激发相近的情感解释项，会识谱者则通过哼唱将简谱重新转化为声音符号传给下一个人，百代公司的唱片将旋律固定下来，广播电台用电波将同一套声音符号送达千家万户，每一次媒介的转换都是符号载体的换形，每一次换形之后都会在新的受众群中激发新的解释项，偏远山村青年从广播里听到这首歌时所理解的“抗战”或许与上海大学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解码号角声、上行旋律时感受到的那种“被召唤”的心理冲动却是相通的；当这首歌被译成多种语言传向世界，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用中文和英文分别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11]并录制唱片时，解释项循环进入了跨文化层面，不懂中文的美国听众无法解码“血肉长城”的歌词神话，却依然能从号角式前奏和不断上行的“起来”旋律中接收到“战斗”与“不屈”的明确信号，这些音乐符号在他们心中激发的解释项可能不是文化相似的“中国要崛起”，而是信念相同的被压迫者要反抗，反法西斯阵营要团结，与《国际歌》有着相似的向内驱动力。但“《国际歌》相较于《义勇军进行曲》，前者指向人类发展的可能性，而后者经由指向民族存亡的救赎而同样具有指向未来的境界。”[12]这一解释项与歌曲在中国的原初意义虽有差异，却共享着“反侵略、求自由”的精神内核，世界学联将其译为《Chee Lai！》并作为全球反法西斯战歌广为传播，正是这个变异后的解释项被再次符号化并再次扩散的结果。至此，《义勇军进行曲》的意义已经不再由创作者单方面决定，而是在无数个传播节点上被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接收者反复“再解释”，完成了一场持续数十年、跨越全世界的符号互动循环，并最终凝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文化符号。

从美学符号到国族认同：历史遗产的当代解码

听觉符号的审美感召：从形式美感到身体共鸣

《义勇军进行曲》的感召力，并非只有来自歌词传达的“道理”，而是来自其作为听觉符号在形式层面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审美冲击，对于音乐符号而言，这是一种前反思的、身体性的感受——毛孔张开、脊背挺直、喉咙发紧、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聂耳与田汉的创作恰恰精准地把握了从“形式美感”到“身体共鸣”的转化机制，让歌曲在听众意识到这首歌在说什么之前就已经用声音本身“抓住了”他们的身体。

田汉的歌词作为能被唱出来的听觉文本，开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以感叹号和祈使句构成急促的呼唤，两个短句形成“召唤—回应”的内在结构，其中“起来”二字以开口音“a”收尾，发声时口腔最大限度地张开，这一语音学上的开放性使得演唱者在发出这个音节的瞬间胸腔与口腔的共鸣达到最大强度，恰如一声从身体深处迸发的呐喊，而“奴隶的人们”则以闭口音过渡，形成一张一弛的呼吸节奏，让演唱者在情绪的起伏中获得生理上的舒适感与推进

力；与此相对，“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句连续使用“肉”“筑”“城”等齿音与爆破音交错的字词，在演唱时舌尖与牙齿的碰撞、气息的短促阻断制造出一种咬紧牙关、字字铿锵的听觉质感，听众即使不看歌词，仅凭这些声音的物理特质也能感受到一种“决绝”与“坚硬”的情绪底色，这种语音层面的审美快感先于歌词意义的传递直接触发了演唱者与听众的身体共振。

聂耳对旋律的处理同样体现了这种身体性逻辑，如前文所述，“起来！起来！起来！”这一句音调逐次爬升、节奏由弱到强，其听觉轮廓与“从蹲坐到站立”的物理过程高度同构，当听众跟着哼唱时声带的紧张度随音高爬升而递增，胸腔的气流随节奏加速而加强，这种生理上的“用力感”与“攀升感”与歌词“起来”所表达的奋起意念完全重叠，演唱者不需要切身去实地感受什么是民族危亡，他的喉咙和胸腔已经在替他先行那股向上挣脱的力量，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以连续递增的短句模拟步伐的加速，旋律的重复与上升让演唱者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加快，仿佛双腿正跟随节拍向前迈进。而另一首同样由聂耳作曲，黎锦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延续了旧制的尾字押韵，句式对仗工整。但作为一首进行曲式的战歌，歌词结构过于拘谨繁琐、欠缺灵活性和召唤感，再加上因循旧制的曲式结构，整首歌曲显得缺乏时代感和力量感”[13]

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非对称结构所带来的听觉新鲜感，与大多数进行曲遵循的整齐对称的乐句结构不同，聂耳有意打破了工整的句式，“根据歌词 的分句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14]。使歌曲在形式层面既保持了口号式的简洁有力又避免了机械重复带来的听觉疲劳，这种“似齐非齐、似散非散”的结构让听众在每一次聆听中都能获得新鲜的形式刺激，既容易上口又不易生厌，其结果是歌曲一旦进入耳朵便难以被遗忘，你不需要刻意回忆，旋律自己就会找上门来，在无意识中持续地召唤你的身体回到那个“挺直腰板、握紧拳头”的状态。正因如此，《义勇军进行曲》的审美感召力并不依赖于受众的文化素养或政治觉悟，文盲可以唱，孩童可以哼，身处海外的侨胞听不懂全部歌词也能被旋律打动，歌曲首先用开口音的爆发力“抓”住了喉咙，用上行爬坡的像似性“拉”直了脊背，用号角前奏的指示性“绷”紧了神经——这一切发生在理性思考之前，正是这种“形式美感→身体共鸣”的审美机制让《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旋律激发了中国人的共有记忆，进而形成共同信念、凝聚国家认同。”[15]

情感共振的仪式场域：从个体解码到集体记忆

一首歌如果只停留在唱片或简谱上，它的意义便始终是私人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却无法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与他人相同。这就需要个体主动从私人领域走出，融入公共领域，获得更多相同意识。“公共领域是和私人领域相对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在各自的私人生活空间之外所形成的一个社群空间。”[16]《义勇军进行曲》正是通过歌咏会、集会、广播等仪式化的集体传唱场景，将每个人在独自聆听时获得的私人化的审美体验，转化为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拥有、共同确认的情感经验，完成了从“我听见了什么”到“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的飞跃。

田汉被捕后，聂耳将写在香烟盒上的歌词谱写成曲，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一首自由体新诗变成人人能唱、人人会唱的战歌？他的解决方案是将复杂的情绪压缩为最简洁、最有力的声音形态。长达十三个字的“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被安放在较低的音区，音符短促而密集，听起来像极了压抑在胸腔里的闷气在翻滚、在积聚；而紧随其后的三个“起来！”则像突然冲破了闸门，音调层层拔高，形成一种释放感，这不仅仅是旋律设计，更是对“从忍受到爆发”这一普遍心理体验的精准描摹。旋律上的这种“先压后放”，让每一个演唱者都能在声音中找到自己情绪的对应物，那十三个字的压抑感，像是受众在面对当时局势时有口难言的憋屈，而三个“起来”的放开，则变成了说不的那一瞬间。这种通感式的创作，使得歌曲在私人聆听时就能引发强烈的个人共鸣。

抗战时期无处不在的集体歌咏场景，让这首歌得以超越个人体验层面而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人齐唱”[17]，昆明联大师生组织的歌咏队徒步两千里沿途教唱，“‘七君子’获释时与数百名迎接群众一同高歌”[18]——这些场景构成了一个个“仪式场域”：在同一个空间里，数千人同时张开嘴巴、发出相同的声音、经历相同的“先压后放”的情绪起伏。这种听觉上的同频催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当一个人唱出“起来”时，紧接着他能听到成千上万个“起来”在回应他——个体的表达获得群体的接纳、扩散与确认。这种“我知晓他人亦知晓”的相互印证，正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心理基石，它并非简单的“众人聚集、各自表述”，而是在同一套符号体系的反复交流中，每个个体皆从他人的表达中感知到自身情感被真实地共享。

场域的扩大并不止于面对面的集会。广播电台让同一首歌在同一时刻进入千家万户。媒介并非只是扩大了听众范围，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想象的共时性。一个正在收听广播的市民知道，此刻有无数他不知道姓名的人正和他听着同样的号角声、同样的“起来”，这种同频共振的心理感受，正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符号层面的最早萌芽。当新加坡电台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每天播音的开始曲、印度德里电台将其用作对华广播的前奏时，这种想象的共时性甚至跨越了国界，让海内外华人通过同一套声音符号确认了彼此的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

由此，《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过程本身便是一部从个体体验到集体记忆的转化史。它从香烟盒上几行潦草的歌词出发，经过聂耳的旋律赋形，再经由无数个广场、军营、电台、唱片机的接力传播，最终在亿万民众的喉咙里反复“再生成”——每一个演唱者都在自己的声音中加入了

自己的情感分量，而这种情感分量又被群体合唱吸收、放大、固化，沉淀为跨越代际的记忆场。这个记忆场一旦形成，便不再依赖于任何一次具体的演唱活动而存在：它成为一种文化底色，潜伏在民族的听觉深处，只要前奏响起，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也会在号角声与上行旋律中瞬间接通前辈们用喉咙传递下来的那种挺直脊背的身体记忆，由此完成了从个人感动的偶然事件到民族认同的必然结构的终极跨越。

共同体意识的符号固化：国歌身份的赋权与认同再生产

从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到2004年正式写入宪法，《义勇军进行曲》从此不再仅仅属于它所诞生的那个抗战年代，而是被赋予了“超越时间的合法性”，成为每一代中国人都必须持续面对和回应的“永恒图腾”。

在1949年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可能更多的作为抗日战争具体历史情境的“功能性”战歌，其有效性在于“敌人当前、危亡在即”的现实紧迫感，而国歌的法定地位赋予了它一个全新的符号身份：它不再是“用于抗战的歌”，而是“代表国家的歌”，巴特所说的“神话”在此完成了最后的自然化——歌曲的意义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拔出”，重新锚定在“国家永恒存在”这一抽象框架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再仅仅指涉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机，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警示性的永恒陈述，告诫每一代人危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居安思危是民族生存的必备意识。同时“把分散的抗争诉求整合为统一的革命力量，在共同战斗中强化集体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实践动力。”[19]

“起来！前进！”不只是对当年战场上士兵的即时指令，而成为一种超越具体行动的精神姿态，转化为“永远不向困难低头”的民族性格的听觉表达，这种去历史化的语义漂移恰恰是符号获得永恒性的必经之路——当一首歌不再依赖具体语境而仍然有效时，它就从事件升华为了图腾。国歌身份更重要的一项功能，是它被嵌入了国家仪式的日常运作中：当学校每周一升旗时奏响国歌，当重大体育赛事开幕时全场齐唱，当国庆庆典中军乐团奏出那熟悉的号角前奏时，“国歌作为共享情感的媒介，通过音乐和歌词传递共同的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

国歌身份解决了代际传递中的“记忆断代”问题：对亲历过抗战的那一代人而言，歌曲的解释项与具体的生命经验紧密绑定，他们曾在防空洞里听到它、在送别战友时唱过它，承载的是血肉模糊的真实记忆，但随着这一代人逐渐离去，未经历战争的后来者凭什么对“血肉长城”“最后的吼声”产生认同？国歌身份恰好使得歌曲不再依赖“真实记忆”来维持其有效性，而是转化为一种“结构性记忆”，即“关于记忆的记忆”：新时代青年对国歌的认同并非因为他记得抗战，而是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每周升旗时老师要求我们站直、注视国旗、大声唱出来”这一系列仪式化的童年经验，国歌的法定地位创造了一个“记忆的传送带”，亲历者的真实记忆被凝练为国歌这一符号载体，后来者通过反复接触这一符号载体在心中建构起对那段历史的“二手记忆”，歌曲的意义不断被“再激活”却永不耗尽。“国歌既具有文化功能，也具有法律功能，使得聆听者或吟唱者能够兼而体验并巩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团结和国家团结，从而自如地面对异质性的现代社会和国家的不同要求。”[21]

同时国歌身份还改变了歌曲的情感指向：在战时歌曲的核心功能是激发反抗，唤醒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战斗的冲动，而当它成为国歌后，其功能重心从对外抗争转向了对内凝聚，每一次升旗仪式中的国歌奏唱更多地指向“确认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归属感，歌曲原有的号角式的进攻性音量在仪式语境中被重新阐释为一种庄严的宣告，在新时代它不再高喊去打敌人，而是宣告“我们仍然站在一起”，这种情感指向的微妙位移使得歌曲得以包容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即便对抗战的历史认知存在差异，不同背景的人仍然可以在国歌仪式中共同完成“站直、肃立、歌唱”这一套统一的符号行为，行为本身的一致性在符号学上先于观念的一致性而存在，它通过在物理层面制造整齐划一，在心理层面诱导出“我们同属一体”的归属感——这正是国歌作为认同再生产装置最为隐蔽却也最为有效的运作机制。“国歌创设了一种“听”音乐的方式，带有共同体标记的国歌，通过提供具备特征属性的辨识度强的符号来指引国民，告诉国民“他”是谁，其国民身份由共同体属性、文化属性共同赋予，使国民通过感受国歌直接联系共同体。”[22]《义勇军进行曲》完成了一条完整的符号转化路径：它从香烟盒上的几行诗出发，在聂耳的旋律中获得了听觉的身体感召力，在抗战的集体歌咏中沉淀为民族的“记忆场”，最终通过国歌法定身份的赋权将自己固化为一枚超越具体历史时空的永恒符号——它不再仅仅是“关于抗战的歌”，而成为“关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听觉证明”，每一代人都在与它的持续遭遇中重新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由此实现了民族认同的生生不息的代际再生产。

结语

《义勇军进行曲》的符号学旅程，是一条从个体书写到集体共鸣、从特定历史语境到永恒文化图腾的意义升华之路。从田汉在香烟盒上写下的数行诗句，经由聂耳旋律的赋形，便不再只是纸上文字，而是获得了直接调动感官、指挥身体的声学力量。它在广场与军营中被千万人齐声唱出，便在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之间架起了桥梁；到最终被确立为法定国歌，便完成了从事件性战歌到结构性记忆的体制化转型，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确认自身国民身份的声音凭证。正是通过多层级符号编码与意义生产的层层叠加，使得《义勇军进行曲》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沉淀为中华民族听觉深处永不褪色的文化底色。每一次前奏响起，它都在向每一个聆听者发出同一个永恒的叩问—

—“你是谁？”而每一次齐声歌唱，都是一代人对这一叩问的集体回答。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 Meng, F., & Zhou, X. (2026). 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塑 [The shap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through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9(3), 15—24, 139.
2. Liu, L., & Guo, L. (2011). 《义勇军进行曲》的文化象征意义 [The cultur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民族艺术研究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24(5), 37—42.
3. Tong, Z. (1987). 《义勇军进行曲》音乐结构的奥秘 [The mysteries of the musical structure of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文艺研究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3), 138—139.
4. Jiang, T. (2015).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分析研究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of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32(4), 149—151.
5. Cao, L. (2014). 论中国抗战音乐的伦理价值 [On the ethical value of Chinese musi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ster’s thesis, 湖南师范大学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6. Barthes, R. (2016). 神话修辞术 [Mythologies] (Y. Tu, Trans.).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7. Cárcamo-Huechante, L. E. (2025). Acoustic colonialism: Acts of Mapuche interferen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8. Zhang, C. (2025). 指示符号 [Indexical signs].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1), 109—120.
9. Zhang, X. (2009). 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看电影符号 [Film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ircean semiotics].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1(2), 429—430.
10. Peirce, C. S. (2014). 皮尔斯：论符号 [Peirce on signs] (X. Zhao, Trans.).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1. Guo, Y. (2026). 保罗·罗伯逊：把中国的抗战唱给世界听 [Paul Robeson: Sing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world]. 百年潮 [Hundred Year Tide], (4), 89—96.
12. Luo, D. (2026). “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汉字美学传统相融合的范例 [“The suffering people of the world”: A paradigm of integrating classic Marxist text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aesthetic tradition]. 北方论丛 [The Northern Forum], (2), 48—56.
13. Weng, W., & Wu, J. (2026). 鲜为人知的另一首《义勇军进行曲》 [The little-known other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党史博采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1), 56—58, 63.
14. Sun, J. (1983). 从战歌到国歌——简析聂耳、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 [From war song to national anthem: A brief analysis of Nie Er and Tian Han’s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94—96.
15. Zhong, R., & Zhang, S. (2025). 以中华认同塑造国家认同：国歌的记忆、象征与文化功能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Chinese identity: The memory, symbolism,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anthem].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i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5), 76—86.
16. Yuan, Z. (2005).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Toward “public autonomy”: The separation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stitutional values].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ianjin Committee of the CPC], (4), 62—68.
17. 昆明市文史研究馆 [Kunm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Ed.). (2019). 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 [Nie Er: From Kunming to the world].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8. 中国文艺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2021, July 24). 国家的歌，人民的歌——《义勇军进行曲》 [The song of the nation, the song of the people: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CCTV-4. https://mp.weixin.qq.com/s/vET0qpaX4dVRk1gUbNssCg
19. Qiu, Z., & Huang, Q. (2026). 长征时期革命歌谣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川滇黔地区为考察中心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revolutionary song narratives during the Long March: A study centered on 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7.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20. Xie, Q. (2025). 论国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 [On the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anthem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伦理学研究 [Studies in Ethics], (3), 9—15.
21. Wang, H. (2022). 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国歌 [The national anthem in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mage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 122—130.
22. Liu, C. (202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歌认同进路 [A national anthem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9(3), 34—45.